

身體、科技、政治： 後人類主義的幾個問題[#]

林建光*

一、前言

猶太裔德國文人班雅民（Walter Benjamin）在其著名的〈機器複製時代的藝術品〉一文中指出，當攝影技術發明時，藝術家關心的主要議題為相片究竟是不是藝術品，但對於攝影是否改變了藝術的本質與內容這一方面的問題卻未見任何討論（227）。班雅民的觀察在二十一世紀高科技產物充塞的現代社會仍然十分具有啟發性。當科技儼然成為周遭環境與身體內部的重要元件時，我們究竟該如何建構一套有關科技、環境、身體、自我的有效論述？在這方面人文學者經常採取被動與保守的態度，而這種被動與保守表現於他們對於科技的焦慮、不安、甚至敵意。某方面而言，人文學者對於科技的不屑或不安，反映出的其實是認知與論述上的落後與無能，也就是說，當科技幾乎全面介入環境與身體時，我們無法生產出相對應的知識系統作為一種應變、解釋或解決之道，反而透過已然失去解釋效力的論述試圖理解新的世界。準此，我們可以從科技的本質、人與科技的關係等問題的探討將這點說得更清楚一些。

二、人與科技

一般認為，科技是人為了改善生活所創造出來的輔助工具，例如汽車讓人們在行的方面更加便利，各式電子電器用品增加人們生活的方便性，而網際網路則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資訊的取得或人與人的溝通變得更加順暢。基本上科技如果只是改善人類生活的工具，那也沒什麼大問題。問題

[#] 本文部份內容為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計畫案支持之研究成果

* 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暨外文所副教授

是，有時候人與科技不單單是使用者與工具、主體與客體、操控者與被操控物的關係那麼簡單。人與科技的關係經常會出現不穩定的狀況，例如人可能被工具化，工具亦可能威脅到人的自主性與完整性，不論何種情況都會導致人與科技的界線產生混淆。大眾文化充斥著許多類似的文化想像，瑪莉·雪萊 (Mary Shelley) 的科幻經典《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故事彰顯了人與科學創造物 (所謂的「科學怪人」) 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無論科技如何進步，「人」的神聖性不容侵犯：有一條界線清楚地將「人」與「非人」區隔開來，取消這條界線不但是愚昧，且是不道德的行為。從這個故事我們發現，一般人傾向將科技視為外於人的物質，人與科技分屬獨立、屬性不同的兩極，前者是先天、自然、有機的生命體，而後者則是人工、無生命的機器或看似有生命但本質上反生命的怪物。

三、「生物控制體」政治

不論人與科技的界線是否真實存在，「人」的確需要藉由界線以確保其 (想像的) 位置與優越性。不過二十世紀科技的普及化，迫使人們認知到所謂的界線經常是武斷、虛構、不斷游移的。二十世紀末關於「生物控制體」(cyborg) 的論述勾勒出一個生動有力的文化圖像，這個圖像彰顯的正是人、機器、動物的混雜性。哈洛威 (Donna Haraway) 無疑是將此圖像發揚光大的重要人物。從文化研究角度觀之，哈洛威的「生物控制體」論，嘗試從策略連結與性別建構等方向，修正激進派女性主義的本質論性別政治。她認為二十世紀末的女性主義，應建立在一種跨越種族、國籍、性別等界線的「類同政治」(affinity politics) 上，而非懷鄉般地擁抱一個「自然」、「本質」的「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 (155-61)。哈洛威認為，二十世紀「生物控制體」的社會真實，為這種強調不完整、諷刺、策略連結的「類同政治」提供了厚實的物質基礎。

「生物控制體」論可能引發爭議的一點是，它的有效性是否僅限於解釋資本高度發展地區以及高度資訊化社會中「人」的特殊樣態，而不適用於其他地區，例如第三世界或傳統社會。也就是說，原始社會裡人與鐵鎚、斧頭等傳統工具的關係，本質上應該與現代社會裡人與電腦、網路等現代科技的關係有所不同。如果現代社會中人與科技的藕合 (coupling) 改變了人的生存樣態，人因此成為「生物控制體」，那麼在傳統社會中「人」依然是工具的創

造者與使用者，工具（例如鐵鎚、斧頭）並未威脅到人的完整性。準此，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可視為從「人」演化為「生物控制體」的過程。

這類看法某種程度上接受了人作為歷史產物的觀點：「人」並無恆常不變的本質，而是與物質、環境互動之後所產生的暫時存有個體。但這種歷史演化論其實並未全盤放棄人本主義，至少在某一歷史時空中，人依然保有工具創造者與使用者的優越位置，而身體、肌膚或心靈意識依舊是區隔人與科技、內與外、自我與環境的界線。事實上，這種看法有時反而容易站在「生物控制體」的現在，回頭哀悼逝去的有機生命，將過去視為失落的伊甸園以及未來人類的前進目標。

從這個角度來看，克拉克（Andy Clark）為「生物控制體」本體論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方向。在《天生的生物控制體》（*Natural-Born Cyborgs*）一書中，克拉克顛覆了以肌膚、腦（skull 或 brain）做為人與環境的界線的看法。他認為人類智能／智慧（intelligence）的特殊之處，在於它能夠與外在環境——亦即非生物（nonbiological）本身的輔助工具——產生複雜、深度的互動。工具並非外於人的輔助物，它們經常是人類認知、理解、解決問題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對於克拉克而言，科技不僅指涉電腦、太空梭、機器人等這些高科技產物，舉凡紙、筆、手錶等日常生活各類物件都是科技，這些科技讓人與世界、心靈與環境產生連結，人與工具因此絕非單純的內與外的關係，事實上工具已經成為人類智能／智慧的內在要素了（5-6）。以語言為例，我們通常會認為語言文字先於智能與思考：透過語言文字此類外在系統，我們將頭腦內部的想法表達出來。但實際情況可能剛好相反：語言文字實際上形塑了我們的思想、認知、概念，所謂的內在思想其實早已被外在物質中介了（Clark 82）。這裡我不是要討論語言先於思想或思想先於語言，或者人使用工具或是工具形塑人這類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想說的重點是：內與外、人與科技的界線，以及隨之而來的完整自我、人類中心的概念，其實是個美麗的幻覺。誠如克拉克所言，生物有機體僅是思想、智能的一小部分，其他有一大部分來自於腦、肌膚之外的社會、文化、科技物質，他稱這些物質為「臺架」（scaffolding）（82）。

在人與科技的互動中，人一直以為科技不過是人類操控的傀儡，而歷史則是由人類導演的一場大戲，殊不知人與傀儡的界線不斷游移、錯位。許多西方科幻小說都凸顯了界線的虛構性，最經典的例子之一是美國科幻小說家

狄克 (Philip K. Dick) 的《複製人是否會夢見機器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儘管狄克似乎仍然無法完全擺脫自由人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作祟，¹不過小說中他也不斷質疑人與複製人的界線是否真實存在。簡言之，對於克拉克而言，由於人與科技並非單純的內/外關係、而包含著複雜的互動、共生連結，因此所謂的「人」其實是天生的「生物控制體」(clark 3)。

四、後人類主義與「即身性」

至少從結構主義以降，西方世界對於人類中心主義的質疑不曾間斷，不論強調系統、符號或權力關係，目的皆試圖解構人本中心的迷思。但九〇年代末期海爾思 (N. Katherine Hayles) 一本名為《我們如何成為後人類》(*How We Became Posthuman*) 的重要著作，讓「後人類」(posthuman) 一詞成為理解現代人類生命樣態的重要概念。從組織架構來看，《我們》是一部書寫自動控制學 (cybernetics) 發展的科技史。依據海爾思的劃分法，1945 到 1960 年是自動控制學的第一波，這個時期的主要概念是「穩態」(homeostasis)；第二波大約是從 1960 到 1980 年，主要的問題是「反身性」(reflexivity)；第三波則是從 1980 年至今，「虛擬性」(virtuality) 是其中的核心概念 (7)。但如果我們將這本書視為一部科技發展史的話，可就大錯特錯了。歷史強調的是客觀，但海爾思卻一點也不避諱自身的書寫政治。簡單地說，她的書寫是企圖在去身體化與強調「離身性」(disembodiment) 的時代氛圍中找回身體與「即身性」(embodiment) 的位置與重要性。²

「即身」與「離身」是《我們》關切的核心議題，而海爾思對即身性的堅持也非常明顯，雖然她對何謂即身性似乎缺乏清楚的解釋。但基本上，海爾思對「人」已經成為後人類卻是堅信不移，她反對的不是後人類本身，而

¹ 請見 Hayles 160-91.

² 這裡我採取廖朝陽老師的翻譯，將 embodiment 譯為「即身性」，disembodiment 譯為「離身性」。廖朝陽老師的文章尚未發表，筆者很榮幸能在由中興大學台文所邱貴芬老師所主持的整合型計畫——「技術與自然：台灣文學、電影裡的環境課題與社會規範」——內部工作坊中讀到廖老師的論文摘要（〈後人類與殖民情境：《玫瑰玫瑰我愛你》的可計算性〉），其中有關「即身性」與「離身性」的討論對筆者有很大的啟發。之後透過電子郵件筆者向廖老師請教，對相關問題逐漸有更深入的認識。廖老師完成的英文論文“Embodiment and Computability”後來在 2009 年 3 月 10 日於國立中興大學舉辦之「『科技與人文』國際工作坊」（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合辦）中宣讀，閱讀這篇論文對筆者更是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是去身體化、去物質、強調離身性的後人類論述。當中，海爾思將後人類主義分成兩類，第一類強調離身性，另一類則強調即身性。在電腦、傳媒、基因工程等科技普及的現代社會，強調離身性的後人類論述明顯佔上風，這類論述認為身體只不過是生命次要的附加物，重要的不是物質的肉身，而是抽象的符碼或資訊模式（informational pattern）。海爾思對於這種去物質、去身體，以模式／隨機（pattern/randomness）取代有／無（presence/absence）的離身傾向感到憂心忡忡（29）。她認為，具有批判性的後人類主義不能離開身體與物質。事實上，自動控制學雖然經常強調離身性，但它本身其實是一部牽涉到性別、政治、權力糾葛的即身複雜史（a history of embodied complexity）。也就是說，即使是強調去身體、去物質化的理論亦有其身體與物質性，那就是論述生產背後的歷史、文化或社會條件。書寫行為因此也是政治行為，而海爾思的後人類書寫政治即是企圖將「人」視為生活在即身世界與即身文字裡的即身後人類（24）。

海爾思與哈洛威都試圖在日益虛擬化、符號化、去政治化的後現代社會中建構一套批判論述。書寫對於兩者皆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書寫不但是再現外在世界的行為，更重要的是其過程形塑了外在世界以及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再現系統與外在世界存在著「循環互動」（circular interactions）的關係，在此關係中的觀察者，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他所觀察的世界。換言之，書寫或多或少決定了我們如何想像自我與世界的關係以及如何面對世界的態度，因此與政治難脫關聯。面對科技滲入生命各個層次的現代社會，我們可以選擇緬懷過去（或許不曾存在）的美好時光，也可以像哈洛威與海爾思一樣，透過論述介入當下，藉以創造某種未來。對於哈洛威，那種未來是建立在「生物控制體」基礎上的社會真實，而海爾思的未來則是由即身的後人類組成的社會。

但海爾思的即身性有一個問題。或許因為太過強調實際政治實踐，她所謂的「即身」偏向主體意識層次，未能深入探索與主體意識看似沒有直接相關的即身性。敘述（narrative）或故事（story）是貫穿《我們》一書的主要概念，從第一章開始海爾思即不斷強調故事的重要性。所謂的科學說穿了其實也是故事，後人類主義固然有其科學基礎，但更重要的是，它是植基於具體歷史、社會脈絡之上的文化敘述，有其具體、特殊的即身歷史，而非抽象、超越歷史的知識（Hayles 21-23）。在第四章，海爾思將自動控制學之父

維納(Norbert Wiener)刻畫成一位焦慮的父親。身為自由人本主義的擁護者，當他發現人與機器已然失去清楚界線，以及自己的理論隱含著顛覆自由人本主義的後人類傾向時，他試圖回到傳統人本主義框架，重新建構人與機器的差異。海爾思以具有性含意的「獨身性」(celibacy)，解釋維納在面對人被自動控制機器(性)汙染時，試圖重拾(或創造)科學家/男性/父親的權威：與機器保持距離，藉以維持其想像的獨身性(108-12)。另外在第九章，海爾思也告訴讀者一些有關「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的故事，裡面包含了個人歷史以及權力機制的運作。她所欲傳達的是「人工生命」絕非客觀的科學論述，它實際上與政治、權力運作息息相關(231-35)。

海爾思的批判式論述肯定了書寫主體的位置，但某方面也削弱了後人類主義的潛在可能性。她的理論造成的反諷效果是：如果即身性僅囿於政治自覺的主體，那麼主體的政治力道不但反而得不到完整彰顯，甚至可能再次掉進狹隘主體的窠臼牢籠。換言之，我們需要一套足以超越狹隘主體，但蘊含主體能動性的理論；既鬆動主體的位置與限制，又不至於將主體化約為去身體化的符號標記；既能解釋即身的複雜度，又能從不斷變化的物質世界當中找到某種規律或深層結構。有關這點，我們或許可以從江士敦(John Johnston)對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里(Félix Guattari)有關「機器哲學」(machinic philosophy)的闡述中找到更令人滿意的解釋。

五、變異與規範：「機器哲學」

根據江士敦的說法，德勒茲與瓜達里的「機器哲學」提供了一套消弭偶發(contingency)與結構(structure)、變化(change)與組織(organization)、有機體與無機體等二元對立思考模式的方式(106-07)。從科技研究的角度來看，德勒茲與瓜達里的「機器哲學」特殊之處在於它擴大解釋了「生命」(life)與「機器」(machine)的意義與範疇。一般認為「生命」與「機器」是相對的概念，但對於德勒茲與瓜達里而言，生命即機器，生命的本質即是機器生成(machinic becoming)。他們的「機器」當然有其特殊含意，指的是一種不具固定意圖、身分或目的性的內在生產(immanent production)動力。既然強調生產動力，那麼重點就不是誰生產(生產的主體)以及生產了什麼(生產的客體)，而是生產、生成(becoming)本身。所謂的「機器」指的是那些不具固定內容與封閉身分(closed identity)，因此可以和其他機器產生連結

(connection)，藉以不斷改變自身與產生新身分的生成動力。於是，德勒茲與瓜達里認為，我們不能從植基於特定位置（意識、心靈、再現主體等等）的概念來理解生命，而應該將生命視為機器連結、無限增生與自我改造或增能的力量。沒有連結就沒有生命，而人類的心靈或意識只不過是宇宙萬物（包括有機物與無機物）眾多機器的一種。當槍、筆或腳踏車等機器與其他機器（例如人的身體）產生連結時，這些機器已經改變、否定、擴大了自身，生命即為這種機器生成的過程（Colebrook 55-58）。

以上強調的是機器偶發與變化的面向，在千變萬化的歷史時空中，某一機器會與其他機器連結、組合，生命即為不斷自我解體／合成、瓦解／（再）創造的動力。但變化僅是機器的一個面向。在無限的偶發與變化之中存在著某種結構或組織，德勒茲與瓜達里認為「裝配」(assemblage) 所包含的正是這兩種看似相反、但實際上並行不悖的要素：偶發與結構、變化與組織（Wise 77）。江士敦也指出，對於德勒茲與瓜達里而言，儘管「具體機器」(concrete machines) 會受到歷史時空影響而不斷產生變化，但在這些具有歷史特殊性的機器背後存在著一種「抽象機器」(abstract machine)，它是不受限於歷史時空條件下的「裝配」，而是既超越歷史，且內在於歷史之中的機器。抽象機器的存在使得具體機器的變化受到相當程度的規範。換言之，抽象機器中介於殊相與共相、歷史與超越、差異與單一之間（Johnston 106-07）。從政治實踐的角度觀之，抽象機器的存在隱含了社會機器革新再造的可能。抽象機器與具體機器兩者並非如精神分析理論所說的存在一種壓抑關係（潛意識遭到意識的壓抑）。相反地，抽象機器確保了具體機器會朝向某種「真實」，兩者因此存在著「虛擬」(the virtual) 與「現實」(the actual) 的關係。因為有「虛擬」，「現實」才可能在每次的重複中開展出新的可能，而不至於淪為空洞的重複（Johnston 119-20）；「時間」也才可能成為「事件」(event) 發生的「時間—意象」(time-image)，而不至於淪為由空洞時間組成的連續時間（Colebrook 56-58）。

德勒茲與瓜達里的機器哲學，提供了一套超越即身與離身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如果在即身與離身、身體與資訊模式、歷史與自然、有機體與無機體之間存在著抽象機器，那麼即身性與離身性就不是二選一的問題，而是同時並存的兩個面向。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離身性」擴大解釋為既超越具體歷史，且內在於歷史之中的抽象機器運作法則，那麼它不但未取消身體，

反而更確保了身體（包括有機體與無體）的複雜度。相反地，雖然海爾思的即身性強調主體的能動力，但相較於德勒茲與瓜達里的機器哲學所闡述的（後）「主體」（不具固定內容與封閉身分的「主體」，因此亦可視為非主體），她的「主體」不但相對封閉，也將即身的可能性囿於封閉主體政治實踐的框架內，未能照顧到即身的「虛擬」以及機器生成的面向，所謂的即身性因此受到「現實」層面的多重限制，反而未能充分實踐真正的即身政治。

六、結語

如同許多新思潮在發酵成形、並逐漸產生影響力時可能產生的效應一樣，後人類主義可能引發人們兩種極端反應：不是過於抗拒，就是過於天真地接受。前者容易陷入一種思鄉情結，後者則一味歌頌後人類主義挑戰現存秩序與改變社會關係的可能性。在台灣也是如此。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所致，台灣的人文研究深受西方文學與文化理論影響，有人持正面態度面對這種跨文化流動現象，當然也有人極力抗拒反對。平心而論，西方思潮與理論固然為本地帶來充沛的文化能量，但往往也容易淪為空洞的歌頌與膜拜。近二十年來的台灣文學／文化論述，充斥著多元、異質、去中心、反體制、反超越的聲音，這類論述未必經過細膩、深入的論辯過程，有時反而比強調中心、一元、超越的傳統論述更加令人憂心。面對後人類社會，我們不需過於悲觀或樂觀，而應嘗試從文化、哲學、科學各個層面耐心檢視它所開啓的自由空間及其內在限制，這部分或許需要跨領域、跨學門之間的合作與整合，顯然我們距離這個目標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引用書目

- Benjamin, Walter.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1969. 217-51.
- Clark, Andy.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Oxford UP, 2003.
- Colebrook, Claire. *Gilles Deleuze*. London: Routledge, 2002.
- Haraway, Donna J.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Hayles, N. Katherine.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9.
- Johnston, John. *The Allure of Machinic Life: Cybernetics, Artificial Life, and the New AI*. Cambridge: MIT Press, 2008.
- Wise, J. Macgregor. "Assemblage."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Ed. Charles J. Stival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P, 2005. 77-87.